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学术文库
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

腐败与反腐败 的经济学研究

倪 星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腐败与反腐败的经济学研究

倪 星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腐败与反腐败的经济学研究/倪星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5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学术文库)

ISBN 7 - 5004 - 4530 - X

I. 腐… II. 倪… III. 廉政建设—研究
IV. D03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42185 号

责任编辑 李 清
责任校对 张 军
封面设计 诚 信
技术编辑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3

传 真 010 - 84017153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三河鑫鑫装订厂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980mm 1/16

印 张 11.375

插 页 2

字 数 213 千字

定 价 2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库》编委会成员

顾问：夏书章 王惠岩

主任：王乐夫

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乐夫	王满劬	马 骏	刘 恒	刘德厚
朱立言	任剑涛	陈振明	陈瑞莲	肖 滨
郭小聪	郭正林	夏书章	曹沛霖	薛 澜
蔡 禾	蔡立辉	廖为建		

夏书章教授题词

“文库”，其实也是“武库”，因为其中贮存的，是思想、理论“武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需要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与公共管理理论密切结合实际的研究，去促进社会主义民主的健康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顺利建设，科学民主决策的成功实行，以及行政管理体制的有效改革，等等。相信有关专家、学者必将共同积极努力，为此作出应有的贡献。

——书贺《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学术文库》开始出版

夏书章

2004年3月

（夏书章教授，男，江苏人。全国著名行政管理学家、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第一副会长、全国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顾问、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博士生导师。）

总 序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恢复行政学教学与研究以来，至今不过 20 多年历史。然而，就是在这短短的 20 多年中，中国行政管理的研究与实践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辉煌成就。它表现在：第一，学科建设蒸蒸日上，学科门类日益齐全，目前已经形成包括一级学科、二级学科等在内的学科体系和涵盖行政管理、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教育经济与管理、社会保障、土地资源管理等不同学科方向的研究与教育体系。第二，教学科研层次逐步提高，形成了以博士后、博士、硕士及学士培养为主干的多层次教学科研体系。第三，科研取得了丰硕成果，出版了一大批优秀教材、专著，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其中不乏在国内外较有影响的力作。第四，实现了范式转换，由此提出了许多新观点，形成了较多有价值的思想，提炼出不少带有规律性的研究成果。行政管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也已深入到行政管理的各个方面，对行政管理分支学科进行系统研究。而且，在基本理论以及行政管理各个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方面，更多地与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进一步紧密地结合起来，互相借鉴与渗透，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行政学学科体系与学科建设在探索中获得了更进一步的发展。1997 年后，随着公共管理一级学科的建立，行政管理的定位进一步得到明确与加强，有关行政管理理论研究成果也更加丰富起来，进而大大促进了行政管理学科建设和教学水平的提高。当然，相对于纷繁复杂的行政改革实践来说，理论的建构还有许多未尽之功，这就为今后进一步加强行政管理理论与实践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在行政管理领域异军突起的队伍中，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于 2000 年 12 月成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在把其建设成为全国惟一的行政管理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学术交流、咨询服务、体制改革等“五个建设标准”的目标的驱动下，全体专、兼职人员不辱使命，努力拼搏，为中国行政管理发展尽心尽力，并且取得了较丰硕成果。展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文库》，就是中心几年来主要科研成果的结晶。过去三年里，聚集在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周围的专家、学者都各自承担了一些国家级、省部级等研究项目，经过几年的潜心研究，成果陆续解出。与此同时，在我们培养的博士生中，一部分博士论文也具有相当创见。为了更好地向社会汇报并接受检验，特决定把这

些研究成果通过出版《文库》的形式郑重推出。这套《文库》有 30 多部著作。我们期望通过这一形式，一方面总结并反映本中心过去三年在行政管理领域研究的基本成果，另一方面也为国内行政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和创新发展作出一点应有的奉献。作为全国行政管理学的国家级重点学科研究基地，中心一直把中国行政管理的发展视为自己的责任，也一直把本中心的发展视为中国行政管理不断开拓创新的一方面缩影。我们相信，《文库》的陆续出版，将是行政管理学界的一件实事。

二

中山大学行政管理学科研究与教育传承久远，最早可以追溯到 1906 年广东法政学堂的行政本科；1924 年，孙中山创办广东大学时将法政学堂并入，使之成为后来中山大学的政治学系，直至 1952 年“院系调整”才告中断。孙中山先生倡导“天下为公”，并从公共管理视阈解读“政治”，他丰富的政治与行政管理理论与实践，是中山大学行政管理学科建设的宝贵财富。著名行政管理学家夏书章教授在中山大学执教半个多世纪，为中国行政管理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作出了显著的贡献，也为中山大学行政管理学科学术地位的确立起着奠基性的作用。20 世纪 80 年代，中山大学行政管理学科重建以来，在国内同仁的关心和支持下，经过广大教师的共同努力，获得了快速的发展：1998 年，行政管理专业获得行政管理专业博士学位授予权，成为全国首批拥有行政管理博士学位授予权的三个单位之一；2000 年 12 月，“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被评定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1 年 8 月，行政管理专业被评定为国家级重点学科并获得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的办学权；2002 年，行政管理本科专业被评为广东省名牌专业；2003 年，获得公共管理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

本中心作为行政管理学科的国家级研究基地，在上级领导的精心指导和学界同行的鼎力支持下，自建立起就确定了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进入 21 世纪，我们将秉承传统，与时俱进，依托既有的成果，以《文库》出版为契机，经过不懈努力，力求把本中心建成名副其实的国家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值此《文库》出版之机，我尚望国内学界同行像昔日那样，继续对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予以关爱和支持，把它办成全国行政管理领域中令人瞩目的学术园地！

三

公共管理学的研究包括本中心的建设必须坚持以下几项根本原则：一是借鉴国外理论与中国实际情境相结合。目前而言，国内公共管理的一个研究重点

还是对国外理论的挖掘与应用，这就需要我们在学习借鉴别人的理论时坚持突出特色，为我所用，既要吸收，又要鉴别，更要创新，始终把建立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理论体系作为己任。二是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相结合。缺乏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行为，远离实践需求的理论研究是空洞的文字游戏。对于公共管理来说，其理论与实践的完善结合尤其至关重要。在《文库》中，既要反映出近年来公共管理领域内重大基础理论的研究成果，又要能体现围绕若干现实问题而作的理性思考与对策研究。三是专业化与多元化相结合。现代公共管理综合了政治学、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相关学科，是一门地地道道的多元化综合性学科，有鉴于此，各个系列的编著者来自于一个或几个不同学科，他们具备各自学科的专门知识与技能，又整合于公共管理这个大领域之内，从而使其成果具有专业理念和跨学科的综合性和互补性特色。四是注重传统与发展创新相结合。现代公共管理学科的迅速发展并不意味着它对传统理论的抛弃，我们应该重视从传统理论中获得宝贵营养；与此同时，更要认识到创新是一切事物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离开对未来环境的分析把握，公共管理就会沦落为实践行为的诠释者而不是先导者的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公共管理理论与学科发展中，也必须保持与时俱进的品质。

四

本套《文库》包括五大系列 30 多部著作，内容涵盖公共管理基础理论与实践、地方政府管理、区域公共管理、政府行为与依法行政等多个领域。

在“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研究”系列中，各位作者努力探索公共管理的基础理论和具体的管理领域，并力图为公共管理建构新的学科体系尽一点努力。该系列包括《中国公共管理理论前沿》、《西方公共行政学理论前沿》、《公共管理基础理论及体系》、《国际公共管理》、《政府公共管理》、《社会公共管理研究》、《国家公共管理》、《比较公共管理》、《电子政务：信息时代的政府再造》、《让渡空间与拓展空间——政府职能转变中的半官方社团研究》等。

在“地方政府与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系列中，各位研究者努力探索地方政府和区域公共管理的前沿问题和热点问题。该系列包括《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珠江三角洲公共管理模式研究》、《中国城市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比较》、《港澳特别行政区公共管理研究》、《中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研究——政府、产权、市场三维互动的透视》（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制度变迁与城市管理》、《亚太地区合作的理论与实践》、《中国—东南亚区域合作与公共治理》、《都市边缘的村庄——广州北郊蓼江村的实地研究》等。

在“政府行为与依法行政研究”系列中，各位研究者研究了政府行为与依法行政方面亟待解决的热点问题。该系列包括《地方政府与就业政策》、《中国

行政监督研究》、《中国乡村权力结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行政复议制度改革研究》、《财政管理体制创新研究》、《腐败与反腐败的经济学研究》等。

“行政管理学专业博士学位论文”系列则是本中心近两年毕业的博士生学位论文选。包括《当代中国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互动关系研究》、《乡镇公共物品制度外供给分析》、《中西古代政府制度及其近代转型路径约束比较》、《公共行政理论范式演变研究》、《当代中国地方政府间横向关系协调研究》等。

行政管理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其发展既有深厚的历史积淀，也有源源不断的后进勃发之势。为此，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将和国内外同仁一道，携手并进，共同迎来行政管理学全面发展的新春天。在此，我们希望这套《文库》能够成为中国行政管理学领域百花齐放之中的一朵亮丽奇葩。

王乐夫

2004年4月26日

(王乐夫系中山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共管理评议组第二召集人、全国高等学校公共管理类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国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目 录

导论	(1)
第一节 对腐败进行经济学研究的可行性	(1)
一、人类行为的经济人特征	(1)
二、腐败活动的经济性	(2)
三、反腐败活动的经济性	(3)
四、经济学分析的普遍性	(4)
第二节 对腐败进行经济学研究的必要性	(5)
一、政治学研究的长处与不足	(5)
二、社会学研究的长处与不足	(6)
三、文化学研究的长处与不足	(8)
四、经济学研究的长处与不足	(9)
第三节 本书的研究思路与基本框架	(12)
一、研究目标与意义	(12)
二、研究思路与重点	(14)
三、研究方法与理论创新	(15)
四、内容框架与章节安排	(17)
第一章 腐败的经济学界定与测量	(19)
第一节 腐败的经济学界定	(19)
一、对腐败的不同解释	(19)
二、腐败的经济学定义	(21)
三、腐败的经济学类型	(23)
第二节 腐败现状的测量	(25)
一、社会测量与腐败测量	(25)
二、腐败测量的主要方法和指标	(26)
第三节 中国腐败现状的客观测量	(29)
一、中国腐败现状的客观测量方法	(29)
二、腐败案件数量与涉案金额的变动	(33)
三、腐败案件涉案人数的变动	(35)
四、涉案县处级以上官员人数的变动	(35)

第四节 中国腐败现状的主观测量	(36)
一、中国腐败主观指标的静态分析	(36)
二、中国腐败感觉指数得分的动态分析	(37)
三、中国腐败感觉指数排名的动态分析	(39)
四、中国腐败现象的演变规律	(42)
第二章 政府官员的经济人角色与腐败的滋生	(44)
第一节 经济人假设的演进与理论价值	(44)
一、古典经济人	(44)
二、新古典经济人	(46)
三、新经济人	(47)
四、经济人假设的理论价值	(50)
第二节 公共选择学派：从经济学到政治学	(52)
一、传统经济学的缺憾与公共选择学派的产生	(52)
二、政治问题的经济学视角	(52)
三、政府官员的经济人角色	(54)
第三节 政府官员的成本-收益核算模式	(55)
一、政府官员的行为成本	(55)
二、政府官员的行为收益	(58)
三、成本-收益分析与政府官员的行为选择	(60)
第四节 作为理性选择的政府官员腐败	(62)
一、政府官员腐败的成本-收益函数	(62)
二、贿赂型腐败中的政府官员行为	(65)
三、贪污型腐败中的政府官员行为	(68)
四、腐败发生的制度前提	(70)
第三章 公共权力委托-代理失灵与代理人腐败	(72)
第一节 公共权力的产生与作用范围	(72)
一、公共权力的产生	(72)
二、政府的职能范围	(72)
第二节 公共权力的委托-代理运行	(74)
一、经济生活中的委托-代理关系	(74)
二、公共权力委托-代理运行的制度安排	(78)
三、公共权力委托-代理运行的理论模型	(81)
第三节 公共权力委托人与代理人的行为倾向	(83)
一、公共权力委托人的行为倾向	(83)
二、公共权力代理人的行为倾向	(85)

第四节 公共权力委托-代理失灵与代理人腐败	(87)
一、公共权力委托-代理失灵	(87)
二、公共权力失控与代理人腐败	(90)
第四章 不同制度中腐败现象的经济学比较	(93)
第一节 市场经济体制中的腐败	(93)
一、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模型	(93)
二、市场经济体制的现实结构	(95)
三、市场经济体制与腐败的产生：政府失灵、寻租与 贿赂型腐败	(97)
四、市场经济体制中腐败的特点	(101)
第二节 计划经济体制中的腐败	(103)
一、计划经济体制的理论模型	(103)
二、计划经济体制的现实结构	(106)
三、计划经济体制中腐败的产生与特点	(107)
第三节 转型经济中的腐败	(110)
一、从计划到市场的经济转型：激进与渐进	(110)
二、经济转型与腐败的产生	(112)
三、转型经济中腐败的特点	(115)
第五章 腐败后果的经济学考察	(117)
第一节 腐败后果的估算：意义、困难与方法	(117)
一、估算腐败后果的意义	(117)
二、估算腐败后果的困难	(118)
三、估算腐败后果的方法	(118)
第二节 腐败对参与者自身的影响	(119)
一、一般分析	(119)
二、腐败对政府官员的影响	(119)
三、腐败对行贿者的影响	(120)
第三节 腐败影响的外部性分析	(121)
一、外部性的一般理论	(121)
二、腐败影响的外部性	(122)
第四节 腐败一般性危害的经济学模型：兼评“腐败有益论”	(124)
一、腐败的经济危害	(125)
二、腐败的政治危害	(128)
三、腐败的社会危害	(130)
四、对“腐败有益论”的评析	(131)

第五节 中国腐败后果的经济学估算	(135)
一、根据官方公布的腐败案件来计算腐败所带来的直接 经济损失	(135)
二、引入腐败黑数和破案率来估算腐败的经济损失	(136)
三、根据经济转型过程中各类租金的规模来估算腐败的 规模和损失	(137)
第六章 反腐败方略的经济学思考	(139)
第一节 腐败与反腐败的博弈模型	(139)
一、作为一种博弈事件的腐败与反腐败	(139)
二、腐败与反腐败的博弈均衡	(141)
第二节 反腐败的经济界限	(143)
一、反腐败的成本与收益	(143)
二、反腐败的经济界限	(145)
第三节 不同反腐败方略的成本—收益比较	(148)
一、思想教育式反腐败方略	(148)
二、社会运动式反腐败方略	(150)
三、制度约束式反腐败方略	(152)
第四节 中国反腐败方略的系统化设计原则	(153)
一、系统化反腐败方略的基本要求	(153)
二、系统化反腐败方略的基本内容	(154)
第五节 以制度创新根治腐败：中国方略	(156)
一、深化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堵塞制度漏洞，消除腐败 机会，使政府官员不可能腐败	(156)
二、强化监督机制，加大惩罚力度，增加腐败的成本， 使政府官员不敢于腐败	(158)
三、承认和尊重政府官员的合法权益，以薪养廉， 使政府官员不必要腐败	(159)
四、加强思想教育和道德约束，提高廉洁自律度， 使政府官员不愿意腐败	(160)
参考文献	(161)
后记	(168)

导 论

第一节 对腐败进行经济学分析的可行性

一、人类行为的经济人特征

人类行为的特征和规律，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而对人类行为的不同假设，构成社会科学学科分野的基础。政治学对人类行为持一种“政治人”假设，如亚里士多德就认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在此基础上，政治学重点研究人类社会的权力分配、意志表达、利益实现与争斗等问题。社会学主张“社会人”假设，分析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的不同角色，研究人们之间的关联活动和互动作用。伦理学则强调人类行为的“道德人”特征，力图通过研究社会中人们共同遵守的重要习俗和惯例，提炼出普遍化的道德律令与善恶标准，以维护人类的共同福利。行政学赞成“公共人”假设，主张政府官员是接受人民委托的代理者，即“人民公仆”，应该在行政管理中自觉地执行人民意志、维护人民利益。管理学则倾向于“企业家”假设，认为人们具有创新精神，乐于承担责任，可以通过不断学习增长才干，能够在不同环境中权变地采用适宜的管理方法，推动事业发展。

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最基本的人性特征是经济人特征。经济人特征是人类行为的基础，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前提，也是政治与社会生活的指针。在以单个个人为分析单位时，经济学假定他在市场中的私人经济活动是理性的，即经济活动中的个人在决策之前要经过仔细计算，力求一个于己最有利的结果，或者是追求他希望实现的目标，或者是追求他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具体到消费者身上，理性行为就是追求效用最大化；具体到生产者身上，理性行为就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公共选择学派把这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私人选择活动中适用的理性原则，应用到政治领域的公共选择活动之中。它认为，在政治环境中，个人同样是追求某种最大化个人利益，即某种个人认为值得追求的目标或有价值的东西。简而言之，人们追求的是最大化效用。影响效用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可以是商品、收入、财富、社会地位、权力等利己因素或个人物质利益，也可以是慈善、友谊、和平、社会进步等精神因素和利他因素。必须强调的是，个人即使在公共选择活动中也首先是在追求个人利益，只是可能比私人市场活动中要隐蔽和复杂一些，但决不是像传统行政学理论中认为的那样，只追求公共利益而不考虑个人利益。

本书研究廉政建设问题，主要采用的是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因此突出强调人类行为的经济人特征。经济学的逻辑前提就是经济人假设，认为所有人都是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政府官员在现实社会中同样扮演经济人角色，寻求更多的权力、声望和报酬。正如贝克尔和斯蒂格勒所提出的，无论是经济领域还是非经济领域，渎职犯罪的当事人都是追求自身最大化效用，并能够进行成本 - 收益计算的经济人。

应该指出的是，人类行为是极其复杂的，任何一种理论假设都只是对现实生活中的某个侧面的抽象，不可能等同于或囊括人类行为的全面现实。人类行为为假设只是特定理论推演的逻辑前提，依此所做出的政策设计与制度选择，也只能解决某一层面的问题。我们注重从经济学角度研究腐败，目的在于对约束个人活动的不同制度环境进行比较，真正地看到人们行为动机一致时不同制度约束的区别，把个人行为结果的差异归因于不同制度的结构差异，从而将研究的重点转移到制度上来。经济分析法并不简单认为人类行为只是由经济和物质利益因素所支配的，它同样认可自利与利他、物质与精神因素对人类行为选择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经济分析只是强调将各种行为影响因素纳入成本 - 收益核算的模式之中，认为理性的经济人会采取于己有利的决策和行动。

二、腐败活动的经济性

腐败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腐败行为是具有成本与收益的。经济学认为，腐败行为是政府官员作为经济人角色的一种有意识活动，政府官员在从事腐败活动时会有意或无意地进行成本 - 收益计算，只有当腐败行为的收益超过其成本时，当事人才会选择腐败活动；而当腐败行为的预期收益小于其成本时，当事人会远离腐败。

作为理性的决策者，政府官员是根据其私人收益和私人成本的比较来决定自身行为的。对于腐败的官员而言，其腐败活动的私人收益包括收受的贿赂、侵占的公共财产、获取的其他方面的物质与精神满足，如满足肉欲、滥用权力勒索他人的精神愉悦，等等。而腐败活动的私人成本则是一种机会成本，主要是腐败活动一旦败露所可能遭受到的损失，包括失去现有的官职、权力、工资与社会地位，受到的法律惩罚、纪律处分、公众蔑视和心理煎熬，等等。

对于腐败者来讲，一旦滥用公共权力即可获得预期的收益。如果将一次成功的腐败活动所得到的收益记为 R ，同时考虑到腐败被查处的风险 P ，则其个人收益函数为： $E = R \times (1 - P)$ 。腐败的私人成本大多数也是不确定的，其实际值的大小一方面取决于腐败行为被发现后所遭受的损失 C ，另一方面还取决于腐败行为被发现的概率 P ，则官员腐败的个人成本函数为： $F = C \times P$ 。

因此，腐败行为发生的条件是：

$$E \geq F, E = R \times (1 - P), F = C \times P, \text{即 } E - F \geq 0$$

由此可以看出,当腐败的私人收益足够大时,政府官员的腐败动机增强;当腐败的私人成本足够大时,政府官员的腐败动机减弱;当腐败的查处概率高和惩罚力度大时,政府官员的腐败动机降低。即,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与腐败所带来的私人收益成正比,与腐败的私人成本、惩罚力度和查处概率成反比。

欲望和动机是人类行为的出发点。政府官员腐败行为的心理动机是其“经济人”角色,而腐败行为之所以发生的现实基础则在于特定的制度条件。在健全、良好的制度中,腐败的私人收益会降低,而惩罚力度和查处概率极高,理性的政府官员权衡利弊得失,将倾向于远离腐败、廉洁从政。而在扭曲的制度环境下,腐败的收益极大,惩罚力度和查处概率却很低,这自然会诱使政府官员滥用权力,以权谋私。

因此,腐败行为具有典型的经济性,是在特定制度条件下,政府官员进行成本-收益计算的结果。通过对腐败行为的经济性的把握,我们可以全面剖析特定腐败活动的成因和规律;通过对制度的调整,我们可以改变政府官员的成本-收益计算模式,从而有效地控制腐败的发生。

三、反腐败活动的经济性

在经济学看来,任何人类行为都伴随着相应的成本与收益,腐败活动如此,反腐败活动也是这样的。腐败活动主要是特定政府官员的一种个人选择行为,是通过私人收益与私人成本的比较而做出决策的。与之不同的是,反腐败主要是一种社会集体活动,纳入经济分析范围的应该是社会收益与社会成本。当反腐败活动的预期社会收益小于其社会成本时,廉政建设往往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或者流于形式。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反腐败的社会收益就是避免了腐败活动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在数量上即等于腐败的社会成本,它包括腐败者的个人成本、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政府合法性的强化、社会道德水平维系等方面的内容。反腐败的社会成本包括建立和维持严格的法律制度的成本、教育和监督政府官员的成本、搜寻和惩罚腐败分子的成本、执法机构与执法人员的运行成本,等等。

从总体上看,反腐败的社会收益是潜在的和间接的,很难直接加以测量,只能通过所避免的腐败活动造成的社会损失来进行推测,因而难以准确把握。但反腐败的社会收益又是十分巨大的,不论如何强调都不会过分。纵观人类历史上的政权更迭、经济衰退、社会动荡、武装暴动,绝大部分都是起因于当政者的极度腐败。尽管历史学家雄辩地宣称这推动了历史的进步,但经济学家却对由此导致的生产力水平大幅度倒退而痛心疾首。如果有一个为政清廉的政

府，这些代价是可以避免的。

反腐败的社会成本则是直接和具体的，易于衡量。预防腐败和惩罚腐败都要耗费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由于反腐败活动的这种特性，往往容易使人们高估其社会成本，低估甚至忽略其社会收益，导致对反腐倡廉的支持力度不够。

另外，由于反腐败是一种社会集体活动，其成果具有“公共产品”的特征，其成本和收益都是由全体社会成员分摊的，会产生典型的集体选择问题。

由于上述原因的存在，现实中反腐败活动的供应量往往小于社会的实际需要量，出现一种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全社会高度关注，需要政治领导人高度重视，需要政府大力开展廉政建设。

四、经济学分析的普遍性

经济活动是人类最重要的社会实践活动，经济分析是研究社会现象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方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指出，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了该社会的经济基础，而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特定经济基础上并受其制约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必须与经济基础相适应。因此，要正确地把握社会问题的本质，掌握其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客观规律，就必须从经济基础出发，运用经济分析的方法。

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资源配置问题的学科，而资源是指那些能满足人们的欲望和要求的物质要素。相对于人们无限的欲望而言，资源总是相对稀缺的。因此，资源的有限配置和管理就十分重要。经济学认为，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人们面临着交替关系，必须在各种目标之间有所取舍，通过比较各种可供选择的行动方案的成本与收益，进行决策。经济学的核心是选择问题，探求人们进行选择时所遵循的基本原则，以实现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可见，经济学并不是局限于传统的物质财富的生产、交换与分配领域，而是可以适用于人类所有的选择行为领域的。人类在经济生活中面临着选择，在政治生活中也面临着选择，在社会、文化乃至私人生活中同样面临着选择。经济学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可以为人们的选择活动提供有益的参考。因而，经济分析是普遍适用于人类社会的。

如前所述，人类行为具有典型的经济人特性，在进行选择时会理性地思考，只有当收益大于成本时才会从事某项活动。政府官员的腐败活动如此，社会的反腐败活动亦是如此。腐败与反腐败活动的经济分析，建立在经济人假设之上，可以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影响因素都纳入到经济人的理性核算模式之中，将不同学科整合起来，形成对腐败问题的系统研究。这种以经济分析为核心的系统研究，不排斥各学科的研究努力，恰恰相反，它广泛